

ZHUZHOU GUJIN DINGMING YUAN LIU KAOSHI

株洲 古今地名源流考释

彭雪开 编著



中南大学出版社
www.csupress.com.cn

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

彭雪开 编著



中南大学出版社
www.csupress.com.c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/彭雪开编著. —长沙:中南大学出版社,
2013. 12

ISBN 978 - 7 - 5487 - 1013 - 4

I. 株... II. 彭... III. 地名 - 研究 - 株洲市 IV. K926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83064 号

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

彭雪开 编著

☐责任编辑 孙如枫

☐责任印制 周 颖

☐出版发行 中南大学出版社

社址:长沙市麓山南路

邮编:410083

发行科电话:0731-88876770

传真:0731-88710482

☐印 装 长沙市华中印刷厂

☐开 本 880 × 1230 1/32 ☐印张 23.5 ☐字数 565 千字

☐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☐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☐书 号 ISBN 978 - 7 - 5487 - 1013 - 4

☐定 价 58.00 元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出版社调换

序 言

原先我一直研究网络思想教育，研究地名亦已6年了。株洲市民政局是地名集成管理机构。前年初，我想与他们合作研究株洲地名源流，得到了分管领导及主要领导的全力支持。之后，在此基础上，我又申报2012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项目：《湖湘文化视角下湘东县域地名源流考释》（编号：12WTB39），及株洲市社会科学联合会《株洲市县、市、区地名源流考》招标课题（编号：ZZSK1306）。于是就有了《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释》的面世。

从研究网络思想教育，到研究历史地名，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。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放弃前者，选择后者。应该说这是一种割爱，是情势所迫。我是全国最早进入网络思想教育这一领域研究的人。那时我利用高校工作的有利条件，方向确定后，志趣挺浓，全身投入。几年下来，就有不少收获了。当我进一步转换视角，深入探讨时，就受到一定的局限。湖南工业大学是地方高校，在湖南当然不错，但放在全国看，非省府驻地，无论是学术研究的平台还是资源、信息、交流等，都会遇到一些瓶颈。20世纪末21世纪初，全国由教育部确立的这方面研究基地，开始是上海复旦大学，后来又新增了清华大学，不久又增加中南大学。中南大学离株洲不算远，但我是专门研究基础理论方面的，主攻方向是“受众主体性研究”，而中南大学则注重大学生思想实际方面的研究。当时，我有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，

想找几个人交流一下，都有些难。虽说有电子网络这一技术平台，但看到的是探讨性的论文，没有同类研究人员思想火花的碰撞，往往难出新意。学术原创性就势必减弱了。这是我放弃这一领域研究的客观原因。

选择“历史地名”这一领域进行研究，开始时，我主要是想研究地名文化。我利用工作之便，跑遍了湖南省 11 个市、州所属的 70 多个县、市。这些县、市的近 60% 的乡镇我都跑遍了，收集了大量的地名方面及相关的文史资料，光考察笔记就记录了 8 大本，近 120 多万字。我将考察笔记进行分类，有些写成论文发表，研究的重点放在乡、镇，有些写成地名文化专著。《湘东地名文化纪事》（中南大学出版社，2009）就是这方面的产物。地名文化方面的成书稿也有 150 万余字了。字多并非质量好的标志，但说明我研究地名文化是下了一番功夫的。

我评研究员职称时，只申报了一个湖南省教育厅的课题。2004 年后，由于说不清的原因，我就放弃了各级各类的课题申报。株洲师专合并到湖南工业大学后，受到学校领导的鼓励，我才将县域历史地名研究作为我的主攻方向。近三年来，在这方面是有些突破了，也发了论文，申报了省级、市级课题，有些收获了。

说到地名文化的研究，也不是突发奇想。有些事情事发偶然，但另有原委深因。我出生在攸县西乡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在闭塞贫困中度过了少年时期。从小我喜欢读书，有较强的求知欲，但贫困的乡村不能满足我这些，使我幼弱的心灵产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想法。那时，我想学音乐、学绘画，没有人指点，后来只好放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专门观察山林中的各种小动物的习性，也搞过一些庄稼的嫁接试验，还成功地将红薯与白薯嫁接成功。当时的心境，不可言喻。1963 年下学期，我离家到 15 里路外的大同附中读寄宿了，不得不放

弃这些试验。我记得第一次放暑假回来，填学籍表格时，我对我的出生地“黄沙桥”、居住地“新虎塘”这些行政村名感兴趣了，问长辈，他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后找到一个老私塾先生，他才给了我一些解释。想不到这些极普通的村名，还藏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和故事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当兵了，随着部队，天南地北转了一大圈，当我的部队驻在上海市江湾、高桥一带时，我对这方面的兴趣也日益增加了。1976年初春，我骑着自行车，还专门到淞江（苏州河）沿岸及吴淞口进行这方面的考察。从部队回乡后，1977年12月，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学习（当时为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，半年后分设为政教系、历史系，越一年政教系又改称政治系）。学的是政教专业，但对地名的兴趣，也不曾减少。而真正引起我对地名研究的兴趣，是在醴陵工作期间。

那时我主管意识形态及科、教、文、卫、体、政法等方面工作，利用公差的机会，跑了不少名山大川，下乡又接触的是山山水水。那时，有人赠我一本《湖南省醴陵县地名录》内部资料，我如获至宝。国内外，我有机会就跑，回来就将有游趣的东西，写成散文发表，这应是地名文化在我心中发酵后的另一种表现。1991年我率醴陵民间书画艺术团访问友好城市日本国瑞浪市。1992年又随中国外宣代表团访问俄罗斯。之后，我陆续写了90多篇散文发表，出了第一本散文集《日俄纪程》。这恐怕与我心中的地名情结有很大关系。从地方转到学校工作后，学习生活条件更充裕更好些，到了高校工作，为了自身专业的发展和工作需要，我选择了网络思想教育研究领域。这应是迫于分工后的一种专业志向，钻进去了，有收获了，也就有兴趣了。是志向第一，兴趣第二。而地名方面的研究，我是兴趣第一，志向第二。进入“历史地名”研究领域后，现在应该是志趣并举了。我这一辈子，恐怕就在这一领域耕耘收获了。正像一个农人一样，哪管

它春夏秋冬，有收获就行呵！

株洲地域，古称赭洲，上古属三苗国。宋、元之交《文献通考》：“三苗之国，左洞庭，右彭蠡。”^[1]杜佑《通典》：“今岳州、潭州（今长沙）、衡州，皆古三苗国。”实际上包括今洞庭湖以南，鄱阳湖以北的广大地域，基本上包括今湖南省、江西省的全部及其他省小部分地区。夏、商、周，今株洲地域，属荆州，多属三苗人、百越人势力范围。1988年6月，在株洲县三门镇燕子村发现了六斗坡旧石器遗存，距今约20万年。这表明今株洲境域内，那时就有人临水而居。1987年，又相继发掘了株洲市磨山遗址，发现了印纹硬陶的陶器及石器、骨器等，经考证为大溪文化的遗存（距今约5300~7000年）。之后，又在今株洲市湘江、渌水、攸水、洙水等流域，发掘了新石器遗址13处、商周遗址125处。这些遗址均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遗存。这表明，今株洲市境域内，就有古三苗后裔、越人居住。而今株洲市区范围内，东向发掘了烟墩冲（今株洲市荷塘区）新石器时代遗址，南向发掘了白关（今株洲市芦淞区）商代银子园村落遗址。这表明在商代前，这一带就形成较大的古村落。^[2]在今株洲市区江南商城一带，发掘了10座战国墓，出土不少珍贵文物。^[3]这进一步说明，其时今株洲市区中心地带有较大聚落或村邑。地下文物发掘证实，早在春秋初中期，今湖南境地多属百越势力范围。春秋中期，楚庄王（前613—前591）大败晋国，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一强国后，在原有向东向南拓展国土的基础上，荆楚文化沿沅、湘溯流而上，占居统治地位。但湘东一带，古扬越势力仍占相当大的势力。春秋末，百越势力才逐步退出湖南境地。在楚人与越人杂居时期，湖南境内今株洲一带，已有不少大小村落，沿江、河、溪、港聚居。早在古三苗人、古越人居住时期，因生产、生活、交往的需要，三苗人、越人部落及部族之间，应有各种村落、城邑地名的称谓，可惜今文献资料中，未留下只言片语。

中国置县，清代赵翼说：“置县本自周，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。”^[4]县字，原作寰。《谷梁传》：“寰内诸侯，非有天子之命，不得出会诸侯。”范宁注：“‘寰’即古‘县’字。”周朝置县源于何时？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五年》记：当时（前 635 年），晋文公勤王有功，天子赐予原、温等县，这说明在此之前，已置县。春秋时楚国，约在楚武王时（前 740—前 690）灭权国置权县。^[5]为春秋创置的第一县。郡之置，《国语·晋语二》：“公子夷吾出见使者曰：‘……君实有郡县。’”此事发生在公子夷（晋惠公）即位的第一年，即公元前 650 年。说明在此之前，已置郡。晋定公十九年（前 493 年），赵简子（鞅）率师伐郑，在誓词中说：“克敌者，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。”这说明这一时期之前，县的地位比郡高。战国中期以前，楚国开拓南疆，每灭一族国、侯国，必置郡、县，边远交界地区多置郡，因地偏人稀，面积大，地位反而比县低，造成了郡小于县的格局。战国中期以后，这一局面才改变，形成郡辖数县的局面。《史记·张仪列传》：秦国为了赎回张仪，愿“将以上庸之地六县赂楚。”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：“孝烈王元年（前 262 年），以黄歇为相，封为春申君，赐淮北地十二县。”可见战国后期，楚置县已相当广泛密集。县、郡设置后，地名始盛行于世，录于文献典籍。从楚武王至春秋中晚期楚惠王（前 488—前 476）止，楚国春秋期间 300 余年间，置县 30 个，皆有其政区地名，如权、那处、申、息、商等，今仍可考证。^[6]

株洲境域（市区），史载地名，源于东汉末年。株洲，古名楮洲，亦名建宁，偶名朱洲。我在《株洲地名略考》中说：古代这一带，冈峦、溪谷、河流遍布，气候温和湿润，森林茂密，动植物及鱼类资源丰富，依山傍水，可渔可猎可耕，最宜人居住。约在《尔雅》成书之后至东汉永康至建宁年间（167—172），因境内濒湘江盛产楮树，江中有大沙洲，这儿形成了楚人（汉人）以地形物产命名的古村落——楮洲。

东汉建安十九年至二十年(214—215)七月间,孙权与刘备划湘江而治,湘江之东划归吴孙权,湘江之西划归蜀刘备。为防刘备渡江袭治,孙权便在赭洲设置建宁县,管辖湘江之东今株洲市区、株洲县及醴陵、湘潭、攸县部分地域。县治首驻赭洲旱草坪(今株洲市东湖公园一带)。

秦汉推行郡县制,今株洲市区及株洲县的县、乡政区地名,已日趋稳定,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政区地名群,而自然地名更是数不胜数。湘东大一点县如醴陵,史载东汉建武元年(25),析临湘县(今长沙县)东南地置醴陵县,设5个乡。一般的县设置4个乡,最小的也有3个乡。乡以下多设亭、里。至明清时,乡置仍不变,但多被里、都政区所代替。而里、都之置,依各县而定,像攸县明洪武时多达52里,清约有30都(里)。炎陵县(原酃县)为湘东地区最小的一个县,至明初亦有3乡9里,明中期增为11里,清初减至6都。乡、里、都之置,这些行政区划地名,记载于县志地志者,至今可见。

株洲市区政区地名群的产生,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。然而,任何政区地名皆源于自然地名及地域地名。首先,是自然村落的形成及地形地物的存在,便有了自然地名。随之有的自然村落因地理、地势、交通、物产、人文等方面的原因,成为当地较为著名的地片名,最终形成地域地名。如赭洲,南宋建炎元年(1127),亦曰南宋绍熙元年(1190),赭洲依谐音简成株洲。自此后,株洲虽属湘潭县地,但为湘东湘江边上重镇,成为著名的地域地名。1951年株洲镇升格为县级市,属长沙行政专署,实现了由地域地名中的乡级政区地名向县级政区地名的转变。

由此观之,今株洲市区的地名群,作为自然地名,早在唐宋之前,就已大量存在,至宋初已形成较成片的自然地名。至元、明、清时,尤其是元末明初之后,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多,自然村落、村邑(集

镇)亦随之增多,至清初,已有相当多的自然地名转化成地域地名,最终形成乡级政区地名。至于乡以下的都、里行政地名,亦就成倍增加了。清光绪《湘潭县记》记:今株洲市区范围内,据不完全统计约有地名150多个,其中政区地名就有一、二、三都,一至六甲(乡以下基层政权)。1951年株洲升为县级市后,乡级政区地名随之产生。1956年株洲市升格为地级市。1966年以后,城市区(县级)陆续建制,1979年撤东、南、北、郊四区,改设荷塘、芦淞、石峰、天元四区,至2008年末株洲市区人口79.5万(户籍人口),常年流动人口约20万,共设27个街道办事处及乡镇,其中乡、镇7个,271个居委会及行政村,其中行政村100余个。其他村辖组地名和其他自然地名,更是不可胜数,至今还无人统计。显然,要对株洲市及株洲市区4个区,27个街道办事处及乡镇,271个居委会及行政村的政区地名,进行比较系统地名源流考释,工作量是相当大的,更主要的是史料不全,甚至遗缺,这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困难与挑战,好在我们寻求了一些切合株洲市所辖县、市区古今地名源流考的一些基本方法,才算基本上完成了原定的研究任务。

学术研究,首先的还是要要有正确的历史观。一切非物质现象,包括各种形态的制度、机制、行为、心智,等等,要从物质中寻找它的动因。春秋战国、魏晋南北朝、民国这三大历史时期,是王纲解体、经济崩溃、民不聊生、社会急剧动乱变化的时期,而与之相适应的是思想文化上的极度繁荣发展。这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结果。百家争鸣、学术繁荣的背后,只是它的矛盾运动的各种表现而已。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先生认为:“学术之变,时势使之然。”

历史,是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及个人的自然的生成过程,它并不受它以外的力量的支配,是影响人的个体、群类、社会、自然发展过程

的重大活动和事件的集合体，是在历史时空中逝去的真实存在。然而，历史的传承，又要有文本的存在。历史的客观性与文本的“真实性”，这会给历史本身，造成扭曲背离“原本”的可能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扭曲、背离、伪造、摒弃的历史事物历史现象，又何其多也。这是历史学上的悖论。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，历史应是客观真实的，但人为的历史，又让历史捉弄人类。学术研究，要占有充分的史料和实物证据。而文字记载的历史，有时又往往稀释模糊，难辨真伪。而上溯的历史，其实物证据，只能靠有限的地下文物考古的发现。由此，造成许多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不得不在故纸堆里，搜罗扒剔，各取其据。中国官方正史，有二十五史、二十六史之说。有信史之说，莫过于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。当然说《史记》是信史，也不能推论其他官方正史都是伪史。但肯定人为历史的现象，是不能排除的。正因如此，这就要求研究历史问题的学者，要充分占有各种史料，务实求真，还历史本来面目。历史地名学是人文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我认为可以归于历史地理学范畴，更应有正确的历史观。

其次，对各种史料，你要下一番功夫，进行甄别，去伪存真。有些副本很烂，表面上言真，其实是托伪，掩饰真相。你要索求历史的“原本”，谈何容易。你得把一切文本，尽量还原为真实的历史。否则，你的学术研究，立论就站不住脚。宋代罗泌著《路史》，说的是“皇古之事”。如果作者把它作为文化现象进行研究，是可以的，偏偏他把它看成是历史，故《路史》多遭史家诟病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说：“皇古之事，本为茫昧。泌（罗泌）多采纬书，已不足据。”原因是书中“纪三皇至夏桀之事，依据纬书及道书，多不经之谈，喜出新意，好用僻辞古语”。明朝郭子章《郡县释名》中，就曾亲历以证《路史》中“枣阳”之误。《路史》的真伪问题，本身是个伪命题。但《路史》的作者把文化当历史，就多遭学者质疑。

历史文化今天已是热门的话题，但历史与文化是有区别的，作适当的划分很有必要。现在有些人，把历史等同于文化，或把文化看成历史。文艺界的历史题材，多有戏说之风，就是这种观点的产物。这是不对的，要承认历史与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有时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难以划分。它们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，但界限还是有的。当然，文化的概念，多元而含混，至今学术界还不能认同一个标准，以致有 260 多个文化概念。

学术研究的方法，民国时期有科学实证方法、义理阐释方法、唯物辩证方法、现代直觉方法等。这些都是先辈们根据国内外的实际情况，融合创新的结果，是一份宝贵的遗产，要继承发扬创新。

有些学术研究方法的原则，也是不能随便破除的。比如说要深入生活的原本，作系统的研究，探寻它的史源；比如说要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具体地分析事物发展的生成过程；比如说要抓住事物的根本，主要特征及关键问题，进行系统的有重点的研究；比如说要用动态发展的眼光，去分析去审视事物发展的未来状况等等。但更主要的是，针对各门具体学科，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各门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内学术界多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，但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如实地考察法（调查研究法）、史料分析法（搜集整理法）、综合分析法、归纳演绎法、辩证思维法（哲学抽象法），等等，这都是行之有效的。至今在学术研究中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当然作为具体学科对象，亦有其不同的方法的特点。作为《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》这一具体课题而言，除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外，我们在大的方面主要采用语言学、地理学、地名学、历史学、民俗学等原则方法。在具体研究时，更多地使用了地名语源分析法、地名语义分析法、地名实地考察法、地名实体考证法、地名地图分析法、地名史源

考证法等。读者在阅读时，会有所体会的。

本书写作时，由于史料不全，考证不够，涉及行政村以上的地名多面广，民间的考察欠缺，加上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又是第一次探讨政区历史地名的源流，因而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和讹误，谨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共株洲市委副书记阳卫国先生；湖南工业大学校长王汉青教授、党委书记侯清麟教授、党委副书记彭希林、纪委书记陈邵桂教授，以及其他校领导；湖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克利教授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教授，对本书的出版，给予了热忱的鼓励和支持，在此我深表感激！

中共株洲市委宣传部、市社会科学联合会、市民政局、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、市文联、市湘东历史文化研究会；湖南工业大学有关部门如党委办公室、行政办公室、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处、思政部、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，以及株洲市荷塘区、芦淞区、石峰区、天元区、醴陵县、攸县、茶陵县、株洲县的县（市、区）志办、民政局，以及市民政局办公室、地名科对本课题大力支持、鼎力相助。在此深表谢意！

株洲市民政局党组书记、局长马民杰先生，对本书的写作、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，特谨致谢忱！也得到了原市委讲师团主任何辉宇教授，株洲市社科联主席、国家一级作家周文杰的大力支持，特深表谢意！

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处长陈益元教授、校评估处处长陈若松教授，副处长陈卫华教授，校教务处副处长易小斌教授，及思政部部长吴长青教授，党总支书记凌四立教授，和思政部同仁、同事；《湘东文化》杂志社副社长向宋文先生，主编骆晓会教授，黄声波副教授、刘年喜副教授、湖南工业大学肖又铮先生；株洲市民政局办

公室吴志军科长、地名科李曙科长；思政部研究生李蔚及其爱人湘潭大学王宇博士及孔意湘、裴静、伍姚、李娇、罗豪、方芳、陈芹等，给予了支持帮助，在此深表谢意！

我爱人谭建娥对书稿进行认真校对，女儿彭婷婷、女婿吕品，姻弟谭建中，对我都给予了悉心的照料和关爱，使我担负的工作，能顺利完成。另外，罗亿洪师傅对本书的资料打印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特表谢意！

彭雪开于芙蓉居
2013 年 10 月

参考文献

- [1] 马端临·文献通考
- [2] 株洲文物名胜志编撰组. 株洲文物名胜志[M].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1991: 134~158.
- [3] 株洲市芦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. 株洲南区志·大事记[M]. 北京: 团结出版社, 2006: 15.
- [4] 赵翼. 陔余丛考·卷一六·郡
- [5] 徐少华.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文化[M]. 武汉大学出版社, 1994: 284.
- [6] 徐兆奎、韩光辉. 中国地名史话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09: 21.

目 录

一、株洲市	(1)
二、攸县	(13)
城关镇(梅城)	(27)
鸾 山	(31)
黄丰桥	(37)
酒埠江	(43)
网 岭	(49)
皇图岭	(53)
新 市	(62)
丫江桥	(69)
渌 田	(76)
桃 水	(81)
柏 市	(86)
上云桥	(90)
菜花坪	(96)
大同桥	(102)
石羊塘	(107)
莲塘坳	(112)

湖南坳	(120)
坪阳庙	(125)
槿 山	(130)
鸭塘铺	(134)
三、茶陵县	(142)
城关镇(首善)	(155)
界 首	(160)
严 塘	(164)
湖 口	(170)
高 陇	(176)
腰 陂	(180)
虎 踞	(186)
潞 水	(189)
浣 溪	(193)
火 田	(198)
枣 市	(202)
平 水	(206)
马 江	(211)
思 聪	(215)
秩 堂	(219)
舫 舫	(224)
桃 坑	(228)
下 东	(233)